

刘尧庭 著

SHITAOZHAI WENCUN

师陶斋文存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师陶斋文存

刘尧庭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教师应该学习陶行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华人精品文丛. 第3辑 / 刘战英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3
ISBN 7-104-02282-1

I. 世...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
世界—现代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4792 号

世界华人精品文丛(第3辑)·师陶斋文存

责任编辑: 黄艳华 缪礼治

美术编辑: 王红玫 岳 仁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 话: 58930242 (发行部)

传 真: 58930242 (发行部)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20

字 数: 240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282-1/I. 888

定 价: 380.00 元(全 1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序 一

方 明

刘尧庭同志是浙江湘湖师范的教师，由于陶研工作的关系，我与他多次接触过，比较熟悉。他要我为他的《师陶斋文存》作序，我非常乐意为他写几句。

刘尧庭同志曾是我们中陶会的理事，浙江省陶研会副秘书长、杭州市陶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是一个基层的陶研工作者。我曾应他的邀请，三次去参加过杭州市陶研会在桐庐、富阳、萧山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还两次参加过他们为杭州行知幼儿园、杭州行知小学和西湖乡中心小学在杭州召开的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汇报会。同时，在他的推荐与陪同下，参观过杭州、衢州的不少实验学校。我还参加过湘湖师范七十周年校庆，为他执笔编写的《浙江省湘湖师范校史》写过《序》，也三次参观过他多年操办的湘师陶行知纪念馆。从我与刘尧庭同志的接触中知道，他从筹备浙江省和杭州市陶研会开始，在当地党政的领导和支持下，20多年来，一直在为浙江普及陶行知研究事业而努力。无论是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还是研究和实验工作，他都踏踏实实地在干，为浙江和杭州的陶研事业打下了扎实而广泛的基础，他的努力是得到了广大陶友包括我在内的认可和赞美的。这一些，从我参加他们的陶研活动中，都已感觉到了；从这本《师陶斋文存》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为陶研事业奋斗的足迹和痕迹。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起，我们的陶研工作刚刚起步。由于陶行知先生的光辉业绩、及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的感召，在全国各省市，我们涌现了一大批为陶研事业奔走呼号、艰苦奋斗的积极

分子。我们“中陶会”曾经表彰过一大批,刘尧庭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批积极分子中,“以陶为师,献身教育”成了他们的旗帜。爱国、革命、求真、创造、奋斗、奉献等陶行知精神,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应该说,我们现在的陶研事业能有今天,与广大陶研积极分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和精神的延续。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在社会主义教育改革事业中,需要这样的“延续”。

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的积极分子,也需要这样的“延续”。

愿大家在刘尧庭同志这本《师陶斋文存》中,吸取一点“营养”,以丰富和充实我们的事业。是为序。

2006年12月6日

(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教育工会主席)

序 二

程融钜

刘尧庭同志是20世纪60年代初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湘湖师范学校任教的,但他却不是一般的教师。他工作极其勤奋,对业务钻研十分刻苦,而且为人正派,思想进步。所以,经过40多年的努力奋斗,他的业绩非凡,成了一位学者型的高级讲师。在师范担任函授工作、语文教学工作、省市陶研会工作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等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他年届“古稀”之时,把工作和研究方面的有关文章选编成《师陶斋文存》,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尧庭同志是我昔日的学生,他要我在“文存”结集出版之际写点文字,我虽已年届九旬,但还是乐意为之写几句话,以表达半个世纪的师生加同志的情谊。

谈到工作,首先他对本职工作尽心尽职,埋头苦干,很是负责。从1961年开始到1996年退休,他在师范函授工作岗位上,一干就35年,而且一直没有间断。即使“文革”期间,除动乱特别严重的几年无法正常工作之外,他都坚守岗位,自觉工作,为函授教师编写教材,讲课辅导,使这些肩负教育与培养下一代任务的教师,其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日益增强。而且,边工作边研究,他写下了不少专业论文,对专业指导作用颇大,影响深广。

其次,特别是20多年来,他热心陶行知研究会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从筹建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到杭州市陶行知研究会起,以至全省近10个地(市)和20余个县(市)的陶行知研究会的发动和组织工作,他都全身心地参与,百分之百地投入,并亲自担任顾问、秘书长、副会长等工作。所以,许多单位的领导和教师都称赞

他为学习和研究陶行知热潮中的“播火人”，我认为这一称赞是贴切的，刘尧庭同志是受之无愧的。除了陶行知研究会方面的工作之外，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方面，他研究得很深，其研究的领域也广，而且很有独创精神。所以，他所写的论文，不但数量多，更是质量高，论人之所未论，鸣人之所不鸣。原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老教育家刘季平同志，生前于1984年7月，在病中给刘尧庭同志的回信中说：“我同意你关于一定要区别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这两种教育救国的道理。同意现在作为一种革命武器的教育，依然要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也同意你肯定陶行知先生不是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而且在这一点上很佩服你的高见。我在1928年转学到晓庄师范后，就曾经因为未能分清这两者的不同而错误地给陶先生扣过改良主义的帽子，直至很久以后才联系其他若干理由弄明白这个道理。……关于你从这个问题入手来评价陶行知先生，我觉得也有好处，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人一味在这一点上纠缠不清。”

关于陶行知研究会工作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刘尧庭同志于2001年8月，在答《中国报导》人物专栏记者问时，他是这样讲的：“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今天，20多年的陶行知研究工作，对我的影响较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播火人’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我在筹建浙江省陶研会和杭州市陶研会，在推动各地陶研工作和促进各地成立陶研会工作中做了一些事情，有不少教师和领导称我是‘播火人’，这是过誉了。说来也是机遇吧！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陶行知研究工作先后兴起，我校是陶行知在浙江参与创办的一所学校。因此，我参与了省陶研会的筹备工作；又由于我们省陶研会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多，领导中都是省市级领导和老教授、老干部等，当时我这个40多岁的副秘书长算最年轻了，具体的事当然要多干一点了。因此，组织、宣传、联络、编资料等什么都干。当时我把自己戏称为‘罗汉堂

里的小沙弥’。你看,上面坐的都是‘金身罗汉’,我位卑言轻,我不干谁干?后来,里里外外接待‘香客’的事多了,省陶研会从开始的70多人发展到2500多人,全省范围内7个地(市)、10多个县(市)陶研会成立起来了,认识我的人也多了。我到许多地方宣传陶行知,各地陶研会成立后请我做顾问,我的‘知名度’也就高起来了。称我是个‘播火人’,其实我是个‘师陶人’。徐特立同志是大家熟悉的老教育家,他是毛主席的老师,年龄比陶行知还大14岁,可是他非常崇拜陶行知,他写过专文《陶行知的学说》,高度赞扬陶行知,还曾申明,自己有个笔名叫‘师陶’。‘师陶’者,以陶为师也。我们已故的中国陶研会首任会长刘季平同志说过:‘中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毛主席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总理称陶行知为‘党外布尔什维’,宋庆龄赞誉陶行知为‘万世师表’。我是被陶行知的光辉业绩感动的。当时我抱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精神,认为陶行知这样伟大的人物,解放后所遭受的待遇太不公平了。他是与鲁迅先生一样伟大的人物,我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从鲁迅看陶行知》,当我应邀在广东省陶研会学术研讨会上宣讲了这篇文章以后,许多与会的陶行知先生的学生称赞我说:‘你的抱不平打得好,对我们启发、帮助很大。’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师陶人’。”

尧庭同志从1984年至1996年,做了12年的省陶研会副秘书长工作,从1991年至今又做了14年的杭州市陶研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工作。这20多年中,概括起来他主要做了三件工作。

第一件是做好湘湖师范教科工作和陶研工作。湘师是浙江省和杭州市陶研工作的基地,尧庭同志是代表湘湖师范学校参加省市陶研会工作的,当然要首先做好湘师的陶研工作。近20年中他在学校领导和师生的支持下,在湘师搞了一个陶行知纪念馆,编写了一本湘湖师范校史,开创了湘师的教科室工作。湘师陶馆,是他一手编辑、布置、管理和接待参观的,搞了近15年,使它成为浙

江省宣传陶行知的唯一基地。湘师校史,是他一人执笔的,编写了湘师70年完整的一部校史。浙江教育出版社的同志说:“这样完整的校史我们还没有出版过,这是第一部。”还有湘师校刊,它是由陶行知亲笔题写刊名的《湘湖生活》,停刊已40多年,1989年由尧庭同志主编复刊,并一手编印了16期,直至1996年退休为止。

第二件是他竭尽全力为省市陶研会做了大量工作。他宣讲了陶行知精神及其教育思想150多场,听众逾2万多人。除参与省市陶研会的筹备与发展工作外,鼓励、支持、促成了20多个地县(市)的陶研会成立;编印了《浙江陶行知研究文集》、《浙江陶研通讯》、《杭州陶研通讯》、《以陶为师,献身教育》及陶行知语录标语等一大批资料。

第三件是写了40多万字的陶研论文。每一篇论文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观点。在宣讲陶行知中也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从鲁迅看陶行知》,宣传陶行知像鲁迅一样伟大;《教师应该学习陶行知》,宣传陶行知在中国历史上是孔子以后的第二位“万世师表”,是值得人民教师永远学习的楷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倡导的精神动力》,宣传陶行知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与当前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息息相通”的陶行知教育学》,宣传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试论陶行知的爱国主义教育救国之道——兼谈“××救国”》,对诸如除武装救国之外的“教育救国”、“文艺救国”等就是改良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等等。这些论文都获得了陶研界、教育界的认可与赞扬,也在许多报刊、论文集中发表转载过,后都分别收入《中国专家论文选集》、《中华新论》等大型论文集,并获得省市级、国家级的多项科研成果奖。他个人也多次被评为省市级和全国的学会先进工作者。省陶研会和杭州市陶研会,也被评为先进学会、先进教育单位。他以“以陶为师,献身教育;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笨鸟先飞,抬头乐干;开拓创造,造福民族”作为自己的格言。陶行知先生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公平的世

界里只有‘人中人’，不该有‘人上人’和‘人下人’。”尧庭同志由此写出了自己的爱国宣言是：“做人要讲人格，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要做利国利民人中人；爱国要讲国格，不欺弱称霸，不崇洋媚外，要做堂堂正正中国人。”从中也可看出尧庭同志的思想境界。

刘尧庭同志还是个文学爱好者，除阅读专业书刊外，也爱读文学作品，他的文学修养也较高。因此，偶尔兴之所至，也写写随笔、杂文之类；或发表，或存之书斋，藉以自乐。

观其这大半生的人生生涯，我觉得尧庭同志的最大长处，就是心中的“乐趣”多。因此，与其说，他艰苦奋斗了一生，不如说，他乐学乐干了一世。一个人能有这样的一种境界，可以说“此生不枉来世一行”矣！

2006年11月10日于杭州市见仁里

（作者系原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杭州市陶研会名誉会长、杭州市教育局局长、杭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

序 三

阙沛霖

刘尧庭先生嘱我为《师陶斋文存》作序。作为相识20年的好友和同事,我欣然遵命,以此庆贺《师陶斋文存》的出版。

1986年3月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在杭州成立,我当时在严州师范学校任校长,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结识了湘湖师范学校的刘尧庭先生。他是成立大会的热心筹备和操办者之一,我深为他对陶行知先生的崇敬之情和勤奋周到的工作精神所感动。1988年10月,我调任湘湖师范学校校长,开始与刘尧庭先生共事,得悉他1961年毕业于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后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是我的校友和学兄。他毕业后就到湘湖师范学校工作,先在函授部任教,后担任函授部副主任。我到湘湖师范学校后,1989年2月新成立了校教育科学研究室,调任刘尧庭先生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在校长的直接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校教科室创刊了每月一期的《湘师简报》,复刊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停办的校刊《湘湖生活》,每半年一期,有效地促进了教育科研在全校的开展和办学资料的日常积累。刘尧庭先生还担任了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杭州市陶行知研究会秘书长等工作,负责校陶行知纪念馆的日常管理和所展内容的调整充实,不辞辛劳,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敬业奉献精神和显著业绩得到了组织上和同事们的一致赞誉,后担任了校教科室主任,晋升为高级讲师,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6年6月退休后,刘尧庭先生继续担任杭州市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热心从事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的学习、宣传、研究和实践工作。1998年湘湖师范学校建校70

周年,刘尧庭先生应邀参加校庆筹备工作,执笔编撰了近30万字的《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校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使湘湖师范这所陶行知先生亲自参加创办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名校有了一座厚重的文字丰碑,也圆了广大校友和师生多年的夙愿。刘尧庭先生多次被评为省、市社科联系统的学会先进工作者,1999年11月荣获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联合颁发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与实践”全国先进个人奖。2002年10月,根据国家关于师范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重大决策,杭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湘湖师范学校的独立建制,并入杭州广播电视大学,成立杭州电大湘湖校区,我也由校长改任校区主任,2003年3月退休后担任了校区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与刘尧庭先生同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并继续一起从事杭州市陶行知研究会的工作。

刘尧庭先生出生在绍兴,深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熏陶,颇有学者风度。他生活简朴,言行耿直,苦干实干,勤于钻研,热爱教育事业,热心社会活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息,累积了关于陶行知研究、陶研会工作、师范教育、函授工作、语文教学等方面的大量文稿,这次择选了120多篇编成《师陶斋文存》,为我们提供了一席难得的精神盛宴,这也是一位老教育工作者、老陶研工作者的心血结晶,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品味,汲取其丰富的营养。

是为序,并祝刘尧庭先生青春长驻,在《师陶斋文存》出版后能拜读到他更多的新文集。

2006年11月10日于潘水苑

(作者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校长)

前 言

知识分子总是珍惜自己的精神产品的,即使见诸报端的一块“豆腐干”,也会视属珍宝,这叫“敝帚自珍”。

我是一个普通的师范教师,生平无大作为。就本职工作而言,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做教师进修的函授培训工作,二是做师范教育科研工作,直到退休。再一件就是额外的机遇,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业余为主,干了20多年的陶行知研究工作,直到2004年。这三件事,扪心自问,自己都是很投入地“全心全意”去干的,现在算完成“历史使命”了。当然,我们陶研界有一句话,叫做“陶研工作没有退休”。既如此,何来完成“历史使命”之说?的确,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据我所知,可以这样讲一句,我们的许多陶研组织,最早的发起者、奔走呼号者,都是离退休干部(或教师)。我们陶研界有许多老同志,虽早已退休了,但一直都在干。如我们中国陶研会会长方明同志,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上个世纪90年代时,方明同志已80多高龄,但为了支持和鼓励我们浙江和杭州的陶研工作,曾经一个人单枪匹马连续六次来我们杭州,参加我们杭州市陶研会在桐庐、富阳、萧山等地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实验汇报会、湘师70周年校庆等。每到一地,他总是不知疲倦地演讲、参观、谈话、题词,连续作战,像小青年一样。现在他已90高龄,我们不是还可以看到他在各地活动的信息吗!我还记得,1998年为了筹备湘师校庆,我再次为湘师陶行知纪念馆调整充实,重新布置。后来方明同志来参观时,我对他说,“我已退休,这是最后一次(布置)了”,他马上说:“不是最后一次,我们陶研工作没有最后一次。”使我这个晚辈羞愧得无言以对。现在,由于身体等原因,我还

是有了“最后一次”，自觉完成“历史使命”，真有负于方老和众多陶友的期望。

在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唯有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似乎还可以看看自己人生历程中的足迹和心迹，聊以自慰。

本书名曰《师陶斋文存》。“师陶”，“以陶为师”也，源于我对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崇拜和学习。

我的人生有两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解放”。我从解放前苦难、辛酸和失学的童年，到解放后在阳光下的努力学习和奋斗。当时我思想上的特点是一切“听党话，跟党走”，基础是“报恩”思想。这大概是当时我的许多同龄人共有的特点。这个时期，我追求目标单一、坚定，但缺乏“独立思考”，缺乏个性。这说明我当时思想上还是不够成熟的。第二个转折是从“文革”过程中，我开始“独立思考”，特别是我从1981年接触陶行知这个历史人物，开始写陶研论文起，接着又受学校委派，相继参与了浙江省和杭州市陶研会的筹建与发展工作。这20多年来的陶行知研究、湘师校史研究、省市陶研会工作等，对我思想上的影响较大。由此：

80年代初，我给自己写的格言是：以陶为师，献身教育；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笨鸟先飞，抬头乐干；开拓创造，造福民族。我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师陶斋”。

90年代，我为《人生感悟录》写下如下一段人生感悟：人生应爱国，“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应爱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生应求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人生应创造，“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人生应奋斗，应“抬头乐干”，“失败是成功之母，奋斗是成功之父”；人生应奉献，而不是索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深感，有像陶行知先生那样六大精神者，是一个高尚而完美的人，当以此自勉并勉人。

21世纪的曙光初现时，我为《情系中华》一书写下了《一个炎

黄子孙的爱国宣言》：做人要讲人格，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要做利国利民人中人；爱国要讲国格，不欺弱称霸，不崇洋媚外，要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这些，与我写的陶研论文一样，都记录了我的思想痕迹。由此，我既有了对党的信仰与追求，又有了对陶行知精神的崇拜和学习，大大充实和丰富了我的人生，也赋予了我的人生特色。

本书《文存》所“存”的，第一、二集主要是陶研和陶研会工作方面的文章；第三集师范教育，主要是湘湖师范校史研究（其中我执笔编写的湘师《校史》，已于1998年校庆70周年出版，就不再收入）。第四、五、六集是函授工作、语文教学和随感。这些文字，曾经得到陶研界的许多朋友（我们叫“陶友”）、湘湖师范的校友、师友，还有学员的支持和关注，多数在有关报刊杂志和论文集发表过，我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支持！现在结集“存”下来，或许奢望能给后人一些“参考”。

20多年前，我初介入“陶研”工作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陶行知，让更多的教师学习和研究陶行知。现在，全国和我们浙江、杭州的陶行知研究形势都非常好。中国陶研会已成立22周年，我们浙江省陶研会成立20周年，杭州市陶研会成立也已15周年，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已遍布全国各地，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非常欣慰。我要重申我20多年来宣传的几个观点是：

陶行知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值得倡导的精神动力；

人民教师应该学习陶行知；

教师要像陶行知那样做人，像陶行知那样重教，像陶行知那样从教。

我，一个师范教师，一生从师范教育出发，最后归结到努力宣扬陶行知，倡导研究学习陶行知。有人曾说我“不务正业”，我说：

“不,这叫‘歪打正着’。”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陶研会、浙江省陶研会、杭州市陶研会!
献给我的陶友、校友、师友和学员!

刘尧庭

2006年11月于师陶斋

“要区别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这两种教育救国的道理”^①

——刘季平同志给我校刘尧庭老师的信

〔编者按〕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刘季平同志曾于1984年7月14日给我校刘尧庭老师一封信，作为对刘尧庭老师所撰的《试论陶行知的爱国主义教育救国之道》一文（此文已刊于《湘湖生活》第13期）的答复。这在当时，是对我校刚刚起步的陶研工作的肯定、鼓励和支持，也是对今后陶研工作的指导。此信已时隔11年，可以说是我校的一份重要的校史资料，也有指导意义。现刊登于下，供我校师生学习和参考。刘老已于1987年6月逝世，我们发表此信，也是对刘老的纪念。

刘尧庭同志：

你的信和大作早已收到。因为身体不好，又有些杂事，在阅读大作时多次被打断，直到最近才读完全文。又经过再三思考，方能抽空奉复。耽误太久，请予原谅。

我同意你关于一定要区别爱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这两种教育救国的道理。同意现在作为一种革命武器的教育依然要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也同意你肯定陶行知先生不是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而且在这一点上很佩服你的高

^① 本文原载湘湖师范校刊《湘湖生活》1995年第14期。